

南北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上海市闸北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闸北区委员会

文史工作委员会编印（内部资料）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闸北区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

主 任：俞佩芳

副主任：韩铭书、周宝山

委 员（以姓字笔划为序）

丁梓国、马 宁、王文林（女）、王国甫、冯 平、甘德茂、
余国安、谷生辉、沈岳峰、吴 越、郑明仁、周宝山、周毓敏

周企吉（女）、竺秀勤、金培元、俞佩芳、张禄懿（女）、

钱普齐、凌曜钧、黄瑞熙、戚泉木、韩铭书

联络秘书：陆飞群

《闸北文史资料》编委会

主 编：俞佩芳

副主编：吴 越、沈岳峰、周毓敏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宁、王文林（女）、吴 越、沈岳峰、周毓敏、
周宝山、竺秀勤、张禄懿（女）、金培元、凌曜钧

责任编辑：周毓敏（兼）

校 对：王国甫

以史为鉴，以文会友，
建设南北，共同奋斗。

桃明宝





历史悠久

品种齐全

质量可靠

欢迎选购

上海铝制品一厂

厂址：中国上海市虬江路1379号

邮政编码：200070

电话：6639616

电挂：上海2931

传真：6639829



孔雀香精

销量全国第一

质量精益求精

上海日用香精厂

地址：上海市南山路99号 电话：6902608

目 录

一、革命史料

- 解放前夕闸北区的地下策反活动……葛世大执笔 (1)
谢晋元和“孤军营”……朱正谊 (14)
英雄的宝山路……陈孝允 (20)
宋教仁英名永存……卢祺义 温举珍 (25)

二、区情风貌

- 闸北的由来及其兴起·灾难·重振……花 扬 (28)

三、史海钩沉

-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被刺始末……吴 越 (37)
黄宾虹与商务印书馆……钱普齐 (44)
我佛山人魂系闸北……温举珍 (47)

四、人物春秋

- “江南猫王”陈莲涛……金培元 杨格 (51)
张元济与陈独秀……钱普齐 (61)
“武术家”王效荣……李志洁整理 (67)

五、回忆录

- “八·一三”淞沪鏖战亲历记……曾坚忍 (70)
我的祖父吴昌硕……吴长邨 (74)

六、文教卫生

- 上海大学最高议事机构变迁简介……

闸北革命史料馆 (77)

解放前夕闸北区的地下策反活动

葛世大 执笔

1948冬~49年春，人民解放军继取得辽沈战役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在淮海战场上获得辉煌成果，粉碎了蒋介石吹嘘的“徐蚌会战”，国民党连续损兵折将、元气耗尽。“宣将剩勇追穷寇”，解放军乘胜挥师直薄长江，京沪解放在望。上海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稠密，党中央定下了“既打军事仗，又打政治仗，军政全胜，完完整整解放上海”的方针。这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众叛亲离，只得退居幕后进行遥控，命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顽守上海，强令拆运工厂机器、物资和大量黄金去台，同时指使军警特务残酷镇压革命群众，不惜玉石俱焚。毛森大屠杀的腥风血雨，白色恐怖弥漫，飞行堡垒日夜嘶吼，革命志士陈尸街头，荒凉的闸北宋公园（即今闸北公园）成了杀人屠场。国民党的垂死挣扎，倒行逆施，更加激发了上海人民的斗争烈火。其中经历了三次武装起义洗礼、富有革命传统的闸北地区人民，早已活跃着一批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地下斗士，他们在中共沪北区委闸北、北站分区委的领导下，通过教师协会，学联、工人协会、职业协会等外围组织，运用义务教育、儿童福利站、群众自己组织等多种形式，发动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并对闸北区国民党上层人物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如争取闸北区区区长王治平和闸北区自卫队队附蒋德润起义等，从而控制了闸北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地区自卫武装，为地下党

广泛开展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根据有关同志的回忆，围绕闸北策反等活动略作记述，以存史实。

一、策反经过

闸北区的策反，是在地下党沪北区委委员兼闸北、北站分区委书记刘祖荣、闸北、北站分区委副书记李国富、分区委委员周绍铮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由党指派负责策反的陈尚藩以及随后参加的李中法，都是原国民党闸北区分区长王治平在原省立上海中学高中时的同学。抗战初期，出于爱国热忱，他们曾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不久联袂赴昆明求学。在党的影响下，李中法于1945年在重庆复旦大学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以下简称（U. D. Y. ），并成为其主要负责人之一；陈尚藩在昆明创办进步报纸，从事新闻工作，胜利后进上海《文汇报》任记者，并于1948年夏参加中共地下党。王治平则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毕业后，考进以蒋经国为教育长的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成为蒋经国系统的重要骨干。他们三人虽然在政治上所走的道路不同，但十多年来仍有所交往，保持着一定的私谊。

1947年底，李中法与陈尚藩在上海与（U. D. Y. ）成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出版秘密刊物，并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常春社”。1948年夏秋之交，王治平受清华大学上海同学会委托，准备在闸北创办清华中学，找陈和李商量，表示愿将学校全权委托他们办理，王只担任校长名义，对教职员工的聘请和教学内容不加干涉。陈在取得所在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和支持后，和李约请了几位进步青年（其中也有个别地

下党员，当时互不知情）分任教务主任及教师。随后即在师生中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1949年春，陈在清华中学发展了个别教师入党，建立了由李国富（化名李一民）同志亲自联系的党小组，使清华中学成为党在闸北区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陈在和王治平的接触中，了解到1947年5月间，王所主办的“共和新闻社”发了一篇揭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贪污的内幕新闻，经各报刊登，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案件涉及宋子文系的委员，而“共和新闻社”是以蒋经国为董事长的，使被报刊渲染为宋蒋之间的矛盾，闹到宋美龄那里。蒋经国因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迁怒于王治平，并经长期审查终于1948年8月间开除了王治平在中央干部学校的学籍及其校友会的会籍，还收回了蒋经国原先送给王的一辆轿车。这对王治平既有政治上的压力，又在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并陷于苦闷。陈将这一情况向党小组长陈定侯作了汇报，并提出趁机将王治平争取过来的建议。这是10月间的事。11月中，上级党组织负责人朱立人又找陈进一步了解王治平的处境和思想情况。当时陈所在的党小组隶属于中共南方局青委领导的科技社团支部。1948年12月底，这个支部划归上海市委统一领导。这时，组织上通知陈尚藩，党已批准对王治平进行策反，并将陈调归沪北区委，闸北、北站分区委领导。此后经李国富、周绍铮与陈反复先后深入研究分析王治平的情况后，决定建立由周绍铮直接领导的、以赵秋之、陈尚藩为成员的党小组，以主持策反工作。后来因赵秋之另有重要任务，改由周绍铮与陈单线联系，此后调集来区参加有关工作的同志，则由陈负责联系。

在党的具体部署和领导下，对王治平的策反进行得相当顺利。在王治平这方面，固然受了大势所趋的影响，但也有他自己一定的思想基础，所以态度比较明朗地接受了党的策反。当时陈尚藩根据组织指示，向王治平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坚决执行党所布置的任务，主要是提供中共地下党在闸北地区活动的方便条件并保证在解放闸北时保持区公所文件、档案、财产、人员的完整，尽可能预防并消除抗拒因素。二、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再追究，但个人不能再有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在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公务时，应尽可能减少对人民利益的损害。三、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共言论，无法避免的表态应以低调处理。王治平也表示完全接受。

二、“职协”支部

当时参加闸北策反地下活动的，除党员外，还有一批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的进步青年。原由陈尚藩联系的外围组织“常春社”本已交由地下党员吴强负责，吴却因未接上关系而失去了联系。经陈请示周绍铮同志，决定“常春社”暂停活动，吴强（当时系复旦大学助教）调闸北区工作，其组织关系留待解放后解决；“常春社”的主要骨干顾伯颖、魏晋元、林同奇、杨孝昌（即杨丁）、王槿生、陈秉恩等也先后来，这就大大增强了开展地区活动的力量。

那时，李中法同志是北新书局的副总经理兼大新印刷厂厂长，印刷厂的厂址就在闸北，曾和王治平有较多的接触，经常出入区公所，区公所上上下下都认识他，这对开展工作是极为有利的条件。经组织同意和在陈尚藩的动员下，他毅

然放弃了副总经理和厂长的职务，但仍以工商界人士的身份为掩护，全身心地投入了闸北区的地下斗争。

还有一位是葛世大同志，他是李中法和陈于抗战时期在后方结交的朋友，和王治平又是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的同学。他向往民主政治，追求进步，在重庆时就曾与李中法一起参加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因转换职业不易，只得参加复员青年军的职业训练工作。在杭州他表面上被视为蒋经国的骨干分子，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却倾向于人民解放斗争，与李、陈保持着密切联系，受进步的影响。1948年秋，他被蒋经国指定参加一个核心组织，为此他立即专程到沪向陈、李陈述全部经过和艰难处境。地下党听了陈尚藩同志的详细汇报后，同意作为外围对象和他保持联系。闸北策反工作开始后，考虑到葛世大有中央军校毕业和青年军联谊会的身分，必要时可以穿着军服指挥武装，经由周绍铮同志直接谈话和考察，同意他潜来上海参加闸北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当时，为了取得更好的掩护条件，王治平在中共闸北、北站分区委书记刘祖荣同意下，曾赴溪口“祝贺”蒋经国40岁生日，制造了与蒋恢复关系的假象。葛来沪后就和王治平暗中配合，常与在沪的蒋经国系骨干分子接触，以资掩护并获取一些情报。

后期参加工作的杨唯力，也是李、陈的老熟人，他在重庆当记者时就参加了民主运动，到上海后一度在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工作，他和陈秉恩（民主青年同盟执委）先后担任过清华中学的教务主任，参与校内外的有关活动。杨唯力家在闸北天通庵路，也成为秘密联络点。

至此，由周绍铮同志领导的策反工作基本完成了人员的

集结，并组成了“上海职业协会”闸北分会的一个支部。其中来自“常春社”的同志，作为一个小组，由吴强负责，其余都采取单线联系方式。

三、打进内层

此后工作重点即转入开展与闸北区上层分子以及工商界的联系，物色策反对象，同时深入地区基层开辟地区活动基地。根据组织指示，首先由王治平把我方人员安置在区公所系统，以便凭合法身份开展工作。于是魏晋元当上铁路以南一个保的保干事，顾伯颖被派为铁路以北一个保的保队附，成为这个保自卫队的实际负责人。他们由此及彼，广泛接触，了解并掌握了其他各保的保长、保干事、保队附的情况和动向，并与部分基本群众建立联系。吴强则按王治平提供的工商界头面人物的名单，进行接触，为建立闸北区工商界联谊会作好准备。王谨生、林同奇、杨孝昌、陈秉恩等则在魏晋元、顾伯颖的配合下，穿行大街小巷，调查闸北的区情地貌，默记工厂、仓库、学校、机关、驻军的位置环境，画成草图供组织使用，为后来人民保安队发展组织、布置岗位以及最后带领解放军追击守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葛世大以上级机关指派名义，由王治平暗中安排在闸北区军民合作站担任主任，这是一个为国民党军队提供粮油、蔬菜等给养的补给机构，通过它可以大体上掌握国民党在上海闸北区的驻军人数、部队番号和布防情况。

在人员安置中，发生过“庄晴助事件”。庄是地下党员，曾在国民党青年军里呆过，因当时闸北区自卫队的上层虽已策反过来，但在队员（士兵）中还没有我们的力量，组

组织上决定让庄晴勋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打进自卫队当兵。经过王治平的安排，已确定了报到日期。谁知就在约定报到的前一天下午，区公所民政股长郁某有事来找王治平。看到办公桌上的一张名单，打头的一名就是庄晴勋。他立即追问名单是从哪里来的，干什么用的，并说他和庄曾在国民党的青年军某部共过事，并知道庄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正要抓他时逃跑了。幸好王治平还能保持镇静，推说名单是民政局刚刚送达，要区里安排工作，并表示一定把这重要情况向民政局反映，还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拨号。郁某走后，王治平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陈尚藩，陈又从周绍铮处拿到庄的地址，连夜通知庄等立刻转移隐蔽，从而避免了一场危险。

在庄晴勋事件之前，还有一位吕冬生（即吕明伦）同志，也因为在原处身份暴露转移到闸北区隐蔽，由王治平安排到军民合作站当办事员，和葛世大在一起，但互不知情。所以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彻底“休息”，除每周与陈联系一次外，不与其他同志接触，他向陈尚藩同志提供过北市场供应国民党军队粮食蔬菜的动向情报。

四、争取上层

闸北的反动武装除驻军和警察分局外，还有由王治平担任大队长的区自卫大队。但王只有名义，实权操在区公所警卫股长兼大队附的蒋德润手里，而且直接听命于市的自卫队总队部。区大队下属三个中队，顾伯颖以保队附身份开展活动的结果，已基本上掌握了其中一个中队，却有人而无枪，因为枪支都集中在大队部。要掌握自卫大队的武装，就必须争取关键人物蒋德润。但这工作又不能由王治平去做，

一则因为关系集中在一人身上容易暴露，不太安全；再则，王、蒋两人关系不洽，难以合作。经组织研究，决定由李中法直接对蒋德润进行策反。安排让李在王治平处“碰巧”与蒋见面相识，然后借机进一步接触。在李向其试探过程中，蒋德润坦诚表示早愿靠拢共产党，且已有人动员他起义。经我们了解属实，为了便于区里集中调度指挥，决定要他切断另一方的关系，接受我们的策反。此后，他在李中法直接联系下，扩充自卫队员、增加枪支、储存给养、提供情报……起了不小的作用。

针对国民党的“乱”，我们就要安定人心，争取民心，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

在闸北区众多的苏北籍人士中，王天任有较高的威信。他在担任区参议会会长时，为人正直，政治上更无劣迹，年高望重，很有影响。组织上决定由李中法、王治平去争取他。经多次接触，他表示在不抛头露面公开活动的情况下，愿意做些安定人心的工作。以后就交由葛世大与他经常联系。在成立工商界联谊会和组织人民保安队的工作中，王天任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时，吴强负责和工商界人士的联系工作有了进展。分别以厂长或主任身份出现的李中法、葛世大，对一些厂商的走访扩大了接触面，加上魏晋元、顾伯颖在保甲工作中发现的对象，便于1949年4月间举行“闸北区工商界联谊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扬子木材厂、大隆机器厂、益丰搪瓷厂、福新面粉厂、大新印刷厂的老板以及木行、绸布店、百货店、烟纸店等中小商户40多家。其宗旨是团结一致，互相声援，抵制国民党的胁迫破坏，维护自身利益。成立后，吴强

以联谊会干事的公开身份和厂商保持联系，并相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此外，还曾一度通过王治平对闸北警察分局副局长王某、吴淞要塞司令邵伯昌等试探策反；陈秉恩也曾对清华中学一学生的家长、汽车兵连长王某试探，都因各种原因奉命中止进行，陈秉恩还由此紧急撤离清华中学，以策安全。以后，陈秉恩虽还因“海光图书馆事件”被捕，却因同志们的机智、谨慎和敌人的愚蠢，终于保全了闸北区的这一部份地下斗争力量。

海光图书馆是林同奇的哥哥林同济教授创办的，也是林同奇的工作地点和住所，曾是“常春社”的重要活动据点，吴强、林同奇等曾在那里收听延安广播、油印出版秘密刊物。5月上旬的一天，大批敌特突然包围海光，冲进去查捕林同奇。幸好同奇不在，而陈秉恩却在那里等候同奇。秉恩虽机智地毁掉了身上带着的闸北联系对象的名单，还诡称是来借书的读者，但还是逃不脱与林同济教授一起被捕的命运。三天之后，秉恩被放了出来（林教授不久也被释放）。这是由于同奇隐蔽得好，油印刊物也已是一年前的事，愚蠢的敌人又错失了陈秉恩这根直接联系到闸北的现成线索，才没有牵连到他在闸北的活动。其实包括陈尚藩、李中法、吴强等人在内的所有在闸北的“常春社”成员，都曾是海光图书馆的常客。当周绍铮同志得知陈秉恩获释时，又立即要求他切断与所有人的来往，绝对地隐蔽起来。”他就在一位朋友的宿舍里，足不出户地一直躲到上海解放。